

书里书外

读书

写给每一个“困在正确中”的人

——读格非《云朵的道路》

■ 贺源

“在道路遍布的今天，为何我们仍觉得无限可走？”

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在新书《云朵的道路》开篇就抛出这个扎心一问。这并非凭空想象——在一次对谈中，格非与哲学家陈嘉映不约而同感慨：过去虽物质匮乏，但未来仿佛无限敞开；如今选择看似丰富，却常令人陷入“每条路都走不通”的窒息感。

当导航App能精确计算每一条路径的最短时间，当“人生规划表”从幼儿园填到退休，我们反而在密布的道路网中彻底迷失。格非的随笔集如同一柄利刃，刺破了现代人安全的神话泡沫。他直言：“安全感是假的，它其实不存在。每一天，我们都处在危险之中。我们为财富、健康做的一切准备，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。”这并非消极，而是对生存本质的清醒认知——人本质上始终处于“无保护状态”，就像旷野中的动物。但格非并未止步于揭示残酷，反而借诗人们里尔克之口指出另一条路：人应当“随冒险而行”，因为生存本身就是“绝对的冒险”。

格非在书中构建了两个精妙的意象：台球的道路与云朵的道路。前者如台球被击出后只能沿着物理计算的轨迹滑行，象征现代人被社会规则锁定的生存状态；后者则如云朵般自由聚合离散，走走停停，甚至突然消失又重生，充满了不可预测的诗意。

这两种道路的灵感源自罗伯特·穆齐尔的《没有个性的人》。格非敏锐地发现：看似自由的现代人，实则活在“台球式”的轨道上——每一步都被精准测算，每一个选择都被预设价值。于是我们陷入悖论：道路越

多，自由感反而越稀薄。

一位读者在访谈中道出共鸣：“小时候没有多少路可选，却觉得生命充满可能；如今道路四通八达，反而常感无路可走。”这恰是现代困境的缩影：规则越精细，个体的命运就越稀薄。

在格非的童记忆里，乡村道路是另一番景象。当城里人问路时，村民不会报出精确公里数或方位，而是说：“看见前面那个磨坊了吗？过了磨坊望见小河，河上有座单边护栏的石桥……”道路不是被规划的，而是被“开启”的——你可以为躲恶犬斜穿麦田，可因急事抄近道，甚至路断了也能踩着沟底石块越过。

这种模糊性、随机性，在格非眼中恰是传统乡村道路的神髓。它象征生存本身的“无规定性”：重要的不是道路本身，而是行人的意愿与行动。只要人想去某处，脚步自会开辟道路；而无人行走的路，终将被大地收回。

反观现代城市，道路已成“法则”的代名词。卡夫卡笔下那近在咫尺却永远无法抵达的城堡，正是当代人的精神寓言：道路再多，都成了无形的牢笼。

面对生存困境，格非将文学视作一扇透光的窗。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，他发现人们沉迷手机短视频后，“需要思考和表达时，大脑好像‘坏掉’了”。而文学能对抗这种“脑腐”，因为它教会我们用隐喻理解生活。

“写作是对生活的隐喻，阅读也是如此。”格非写道，“文学通过‘光亮’让我们有能力对自身处境进行反思。”当读者在《包法利夫人》中看到自己的欲望，在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中照见对虚假安全的执念，便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：“别人的写作也变成



了你的写作”。

更深刻的是，文学提供双重可能：一是模仿现实，让我们看清生活真相；二逃离现实，让痛苦被审美距离稀释。

格非剖析乔伊斯《伊芙琳》中逃离失败的女性，也欣赏《奥德赛》里佩涅洛佩用编织对抗时间。这种“逃离”不是懦弱，而是弗洛伊德所说的“迷醉”——如同酒神带来的创造状态，让我们暂时悬置现实压迫，获

得喘息与疗愈。

对当下盛行的生存焦虑，格非的见解直指核心：焦虑源于对“不确定性”的病态恐惧，而解决方案恰是拥抱这种不确定性。

他引用尼采的“掷骰子理论”：“骰子掷出去有无数的偶然性，但不管点数多糟，都要肯定自身的生命”。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·伊里奇正是反面教材——一生筑造安全防护堤，结果“不过是将自己纳入生活惯性，白白浪费生命”。

面对现代人最深的虚无感，格非搬出鲁迅那句箴言：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。”既然绝望也非坚不可摧，人就永远保有选择的可能。在“人生如梦”的虚幻感中，他看到的不是消极，而是惊人的解放：“既然世界如梦境虚幻，我为什么不按自己愿望生活？为什么不马上做想做的事？”

放下书时，窗外正飘过一朵奇形怪状的云。它不遵循导航路线，不在意是否“掉队”，甚至不保证明天依然存在——却拥有台球永远无法企及的自由。格非的文字没有给我们铺设金光大道，而是温柔地卸下我们背负的轨道：“路是‘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’的时候，你才能体悟到‘行走’中隐含的自由与生命意志。”

在这个朝不保夕成为常态的时代，有人疯狂追求上岸，有人试图藏进保护壳。而格非站在清华讲台，却对年轻人说出反常识的真理：“危机反而能将潜能激发出来，帮我们下定决心突破惯性。”当无数人生导师教我们如何精准命中目标时，《云朵的道路》给了我们飘向远方的勇气——因为真正的生活，永远始于那条被脚步开启的小径。

读有所得

■ 聂顺荣

《名门家风》由沈秀红著、华文出版社出版，其独特价值在于以八年寻访为基础，串联起33位近现代嘉兴籍文化名家后人的讲述，为读者打开一扇洞察名门精神传承的窗。这不是简单的家风故事汇编，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，引领我们在细腻叙事中，解码那些滋养家族、启迪世人的传承密码。

书中最直观的冲击，是名家们“先做人、后做事”的教育根基。弘一法师“士先器识而后文艺”的箴言，如同一把标尺，丈量着人格修养与才学技艺的先后权重。在当下，教育常陷入“功利化培养”的泥沼，家长们汲汲于让孩子掌握技能、追逐成绩，却忽略了“做人”这一教育的原点。孔另境用一生诠释“做大事的人”，提醒我们：教育的终极指向，应是培养有良知、有担当、有格局的个体，而非精致的“技能工具”。这种理念，是对教育本质的回溯，为迷茫的现代教育提供了清醒的价值锚点。

顺着“做人之道”深入，能发现不同名家各有侧重却又相融共生的精神维度。茅盾父子的故事，将“低调、心怀天下、淡泊名利”具象化。茅盾以1500余万字著译成果奠定文学地位，却在个人介绍中轻描淡写；临终捐出25万元稿费、设立文学奖，尽显无私大爱。其子韦韬延续这份精神，婉拒政府接送、自费买土特产，把“淡泊”融入日常言行。在当下社会，“流量至上”“名利崇拜”盛行，人们习惯用财富、地位丈量价值，茅盾家族的选择，恰似一股清泉，冲刷着浮躁的心灵，启示我们：真正的价值，藏在对社会的贡献里，而非个人私欲的满足中。

王国维“不贪财，不争利”“学术非功利”的教诲，同样戳中时代痛点。在“内卷”“功利性竞争”成为常态的今天，学术领域也难逃“量化考核”“成果崇拜”的裹挟，很多人做学问只为“出成果、评职称”，丢失了求知的初心。王国维要求子女“出于兴趣求知”，是对学术本真的捍卫，更是对人性中“纯粹热爱”的守护。这提醒我们，无论身处哪个领域，保持初心、远离功利，才能真正触摸到事物的本质，收获精神的富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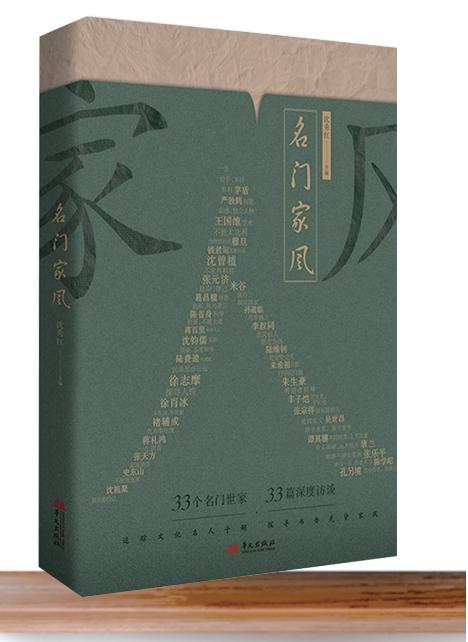
丰子恺的家风故事，为快节奏社会注入“松弛感”。他用童真童趣感染家人，以《护生画集》传递慈悲，让子女在自由氛围中成长。在“鸡娃”成风、孩子被各类培训班塞满的当下，丰子恺“任由子女依兴趣发展”的教育观，宛如一片宁静的绿洲。他的后人俊才辈出，证明了“松弛教育”并非放任，而是给予孩子探索自我、滋养热爱的空间。这启示现代家长：教育不必是紧绷的“冲刺跑”，可以是舒展的“漫步走”，让孩子保留对世界的好奇与热爱，才能走得更远、更从容。

书中其他名家的家风片段，同样闪烁着智慧光芒。米谷撕毁电影票，教会女儿“守信用”；张元济以“无书不成其为家”营造书香氛围；沈祖棻用精神力量战胜贫困……这些细碎故事，拼凑出一幅立体的“家风传承图谱”，让我们看到：良好家风，不是宏大的教条，而是父辈言传身教的日常，是融入生活细节的价值传递。

阅读《名门家风》，于个人而言，是一场精神洗礼。它让我们在名家故事中，对照自己的成长与生活，反思是否遗失了“做人”的根本，是否在功利浪潮中迷失了初心。于社会而言，它是一份珍贵的“精神遗产”。在道德失范、价值多元的当下，这些家风故事，能凝聚起“真善美”的共识，成为滋养社会文明的养分。

更深远地看，这本书为文化传承提供了独特视角。嘉兴籍名家的家风，是地域文化与家族精神的交融，透过它们，我们能窥见一方水土如何孕育人文精神，又如何通过家族传承延续文化脉络。这启示我们：守护文化根脉，不仅要保护古迹、典籍，更要传承这些融入生活的精神基因，让文化真正“活”在当代人的言行中。

《名门家风》的价值，在于以小见大，用一个个家族故事，编织出近现代文化名家的精神传承网络。它让我们看到，良好家风是跨越时代的“精神脐带”，连接着过去与当下，滋养着个人成长、家族延续，更能为社会文明注入持久动力。当我们在故事中解码这些传承密码，也获得了重构精神世界、传递正向价值的力量——这或许就是阅读此书，最珍贵的收获。



创作谈



探寻小说技法之妙



在本书中，我重点谈论的是小说的故事设计、结构设计、细节设计、开头设计、高潮设计、情节设计、对话设计、景物设计、深度设计、人物设计以及结尾设计，而在另一本即将出版的《匠人坊》中，我还将就小说的多种技艺手段（譬如现实主义的写法定律、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定律、意识流写作的写法定律、荒诞主义的写法定律等）进行专门解析。

小说的设计规律是大抵可寻的，这是我在《匠人坊：小说技法十二讲》中多次强调的一个观点。我也为此准备了充分的例证，在每一种设计技巧的阐释中，列举至少3篇经典小说，探究它们如何使用这一技巧及其共有的倾向和各自特点。说大抵可寻，一是基

于前人在“不断试错”的过程中积累得到的基本经验，另外也是基于人类不断被培育出的审美习惯和接受习惯。事实上，那些伟大、卓越的作家都是素质良好的心理学家，他们知道在小说写作中如何与读者完成“暗博弈”，如何“吊读者胃口”，知道读者的心理需求，知道如何勾起或满足这种需求，知道小说中的哪些点能够唤起读者的精神共鸣……而这些，恰恰印证着小说设计有其规律，其规律应当被理解，也应当被尊重。

在阅读和写作中，我越来越意识到，优秀的小说往往是精心设计出来的，而越是外表上看起来“天衣无缝”、水到渠成的小说，用功则越深。只是作家会尽力掩盖设计的痕迹，让自己的文字看起来和顺自然，并不着力。在这本书中，我有意寻找那些“天衣无缝”的设计并进行解析，这些可能是不从事小说创作的理论研究者不容易注意到的。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愿意为大家分享和揭秘其中的玄机。

我试图像庖丁解牛那样，在拆解小说技艺的过程中尽可能精确而纯粹，谈故事设计便只专注于故事，谈细节便只专注于细节。但小说技艺无法完全与内容割裂开，技艺的美妙往往连接着内容的深刻。因此，在谈论技艺的过程中，我也有涉及小说的内容诉求：是小说的说使得技艺变成这个样子，而这种技法之所以在A点是这样使用的，而到了B点又那样使用，其根本在于内容的不同、表达的不同，以及作家预期的效果不同。所以，在谈论技艺和它的设计时，我往往回避略涉及内容呈现、思想呈现，涉及“这种方法”对特定表达的贡献。自19世纪以来，诸多文学技法的实践其实更多关联着“看世界”眼光的改变，技法和思想的黏连变得难解难分。因此，我们在学习技法技巧时，也要拓展思维，发现和体味某个方法中所蕴藏的“认知力量”——它也是我在这部书中反复提醒的。

有作家曾说，小说本身即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，我深以为然。对一个细节、一个关键的人物对话、一个故事的转折点或仅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词的运用，作家可能都需要在大脑中经历风暴，为这一个选择找一二三个专属的设计方案，然后再仔细掂对，在一次次试错中寻找好的、更好的，直至找到那个自己能力范围之内“最好的”。我愿意借助本书，和朋友们一起认知、发现和掂对文学设计的普遍规律，并从中一起找见“设计的乐趣”。当然，发现和认识到小说设计的基本规律之后，并不意味着我们掌握了它就不需要再反复试错。恰恰相反，它要求我们在掌握规律之后不断尝试全新的创造，不断向这一规律发起冲击，看看它还有没有突破的可能。在强调技巧有规律可循的同时，我还要强调小说设计的“唯一性”和“唯适性”：这个动作和反应，只能是林黛玉的，换给薛宝钗或晴雯它就不成立；在《红楼梦》里出现的“黛玉葬花”一节足够经典，我们可以找见它的设计规律，但这一细节没有人可以再使用第二次，就是作者本人在另一部书中续写林妹妹的故事，也不能让它再重复出现一遍。极具个性化的情节细节，不论是前人用的，还是你自己用的，用过一次之后就不能再用，这也是小说设计中最苛刻的设计原则之一。

我试图用整体性视野，尽量让我分析的对象更全面，多涉及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。在这本书中，我给予非汉语的西方小说、拉美文学以更多的解析侧重，对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的前沿艺术探索给予了更多侧重——我坚信鲁迅的“拿来主义”。同时，我也有一个比喻，吃羊肉、吃牛肉绝不可能使我们变成羊或牛，我们长的，是自己的肉。我们从那些“他者经验”中汲取到的，可以转化为我们的写作经验。开放和博取的态度，帮助我们写出更有思想深度和引人共鸣的“中国小说”，让我们的文学创作被更多国家和民族的读者敬佩、尊重。

对于到达罗马这件事儿，前人已经踏出了上万条路，我们一起来审视他们是如何做到的，是否方便、快捷、有效？即使已经有了这么多条道路，我们是否还能为它再添上一万零一条、一万零二条？写作《匠人坊：小说技法十二讲》，是裨益而不是困囿，我希望它能激发我们创造的乐趣和与前人的竞胜之心。（来源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）